



中华书局

WENSHI ZHISHI WENKU

明清时期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文史知识文库

吴孟雪 著

文史知识文库

明清时期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吴孟雪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吴孟雪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文史知识文库)

ISBN 7-101-01942-0

I. 明… II. 吴… III. 中国—评论—欧洲—中世纪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594 号

文史知识文库

明清时期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吴孟雪著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10 $\frac{1}{2}$ 印张·2 插页·208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4.00 元

ISBN 7-101-01942-0/G·144

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这套书本来是以“文史知识丛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成“文史知识文库”。“丛书”改成“文库”，目的是使这套书容量大一些。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仅容纳《文史知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文史知识》未能刊发的好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出地、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国人民重振雄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新的崛起，新的振兴。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在计算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超导体、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深深感觉到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以至于我们伴随着每一项现代化工程的伟大胜利，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篇章的人们。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这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这是

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发展、强盛的力量。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我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对我们祖先繁衍发展的土地,怀着深切的挚爱之情。爱她,了解她,同时研究她;在了解她、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念。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重新崛起的决心,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我们一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区分糟粕,在看来杂乱无章、盲目被动的历史表象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服务,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服务。

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共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前 言

当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成为昨日的辉煌之后,欧洲人却完成了横渡三大洋、开辟新航线的壮举;当清初的中国政府自我陶醉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幻想之中而闭目塞听、于世界大势茫然无知之时,欧洲人却在睁开眼睛、拿着刚发明的望远镜眺望世界,观察中国。

明清之际,中国在欧洲人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欧洲人的“眼睛”说起。

欧洲人通过丝绸之路早就知道东方有个文明古国,但由于高山雪原挡住了欧人的目光,他们不知道这个文明古国就是中国。他们只能从色彩鲜艳,制作精良的丝绸上来想象彼端的世界,据说那儿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小昆虫,喂到第5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所以他们把中国称为“丝国”。就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知识而言,可视为“盲眼”,从博学的普林尼(Plinius)到地理学之父托勒密(C. Ptolemy),莫不如此。

欧洲人直到中世纪,才亲眼看到了中国并留下了记述。那正是中国的元帝国之时,领土混一欧亚,中西交通畅行无阻。柏朗嘉宾(Pian del Carpine)、卢白鲁克(G. de Rubrouck)、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蒙德高维诺(Monte Corvino)等辈梯山航海而至中华。然而,他们

的眼中只看到了中国的物产、富庶和奇风异俗,但中国的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还是他们视野中的盲点。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处于半盲人一只眼的状态。16世纪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J. de Barros)曾在他的著作中说,中国人像希腊人那样,把其他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野蛮人大都是盲人。就对中国文明了解的程度而言,巴洛斯认为中国人把欧洲人看得开化一点,是一只眼的半盲人。(拉希《欧洲形成之时的亚洲》)

尽管如此,“一只眼”毕竟看到了中国,在欧洲人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因此,本书在论述明清之季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时,就是从欧洲人“一只眼”的时期,即大元帝国之时起笔,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读者了解到,当时的欧洲人看到了中国的什么,又漏掉了什么,明清时期的欧洲人又在哪些方面拓宽了自己的眼界,在哪些方面透视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中国在欧洲人的眼中是如何从朦胧而至清晰的。

随着元帝国的崩溃、中西交通的隔绝,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停顿了近两个世纪。“无论是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的游记,还是欧洲传教士如蒙德高维诺等自中国写往欧洲的信函,都逐渐被欧洲人遗忘;他们笔下的那个国家渐渐成为了传奇。”(《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欧洲人对中国的知识,又回复到“盲眼”的原状。这一点,可以从1508年2月13日葡萄牙国王孟纽尔(Manuell)向即将远征东方的舰队司令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中得到证明。这位国王指示他的舰队司令要“侦察一切有关中国的情报”,其中有:

中国人是否富有？懦弱还是强悍？有无军器火炮？身材多大？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不大？是否不止一个国王？他们如果不是基督徒，信仰什么宗教？崇拜什么神？有什么风俗习惯？中国的国境延伸到什么地方？和哪些国家接壤？（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

明王朝建立了一百多年后，而一般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还是“大汗的契丹”。这其中还包括以其对天文、地理的博学而闻名于欧洲的佛罗伦萨的名医保罗·托斯卡内（Paolo Toscanelli）和热那亚大航海家哥伦布（Columbus）。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刺激了中世纪末期西欧一些国家（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极力寻求海外贸易并扩大其财源和势力范围的欲望。在黄金的咒语下，欧洲人从东、西两个方面开辟航线、抵临中国。当然，无论是达·伽马（da Gama），还是哥伦布、麦哲伦（F. de Magalhaes）诸辈，当他们完成横渡大洋的伟业之后，并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一个孤立的、分散的世界历史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在两大文明的汇合中，欧洲将走近中国，中国将走近欧洲。

文艺复兴精神的熏陶，科学技术迅猛的发展，使欧洲人的“眼睛”有了质的进化。这种进化，不仅仅是表现在他们从只有“一只眼睛看中国”发展到用“两只眼睛”看中国，而且还表现在“双眼”的透视力和观察力上。通过长时的中西文化对比，他们发现：在伦理、道德科学方面，中国人有两只眼，欧洲人仍是独眼；但在哲学、科学方面，中国人却缺乏欧洲人的那只眼睛。例如：

18 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首领狄德罗在评论中国时说：

我们是大诗人，大哲学家，大辩士，大建筑家，大天文学家，大地理学家，胜过（中国）这善良的人民，但是，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如果有一天发现，这种科学是居于一切科学的第一位，那么，他们将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有两只眼，而我们只有一只眼。（严绍璁《日本中国学史》）

德国千古绝伦的大才子、集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莱布尼茨（G. W. Leibniz），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立志将中西文化熔为一炉。他的中国学知识让他认识到：

中国人尽管几千年来以令人惊叹的热情追求着自己的学问，他们的学者可以戴上最博学的桂冠，然而他们始终却未能建立一门精密科学。究其原因，我以为，他们缺少欧洲人的那“一只眼”，即数学。他们视我们为“独眼”，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一只眼，那就是中国人自己还不够发达的“第一哲学”。有了这“第一哲学”，我们就能够认识那些非物质的东西。（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

明清之际的欧洲人，正是凭借着这双“哲学之眼”，对中国及中国文化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式的审视。从此，中国在欧洲人的眼睛中，再也不是拉丁诗人所想象中的丝国梦境，也不再是罗马、希腊地理学家所描绘的虚无飘渺之地。曾轰动欧洲一时的《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拱手相让辉煌，蒙德高维诺之辈的报告，更显得那样平淡无光！

然而，正像欧洲人认识中国有一个从“盲眼”到“独眼”、“双眼”乃至“独具慧眼”的“进化”过程一样，在明清之季的这

数百年——本书的时间跨度是起自 16 世纪、迄于 19 世纪初，欧洲人看中国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大致而言，有以下 4 个时期：

第 1 个时期为 16 世纪。此时欧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不外乎主要是疆域宽广、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风俗奇特，和以前的游记见闻所介绍者相去不远，所新见之者，是中国的文字、教育、三教、法律、吏制、政府组织等，长城、饮茶、印刷术等开始映入欧人的眼帘。透过神秘之雾，欧人似乎朦朦胧胧地看出：中国就是传闻中的契丹。

第 2 个时期为 17 世纪。与以前介绍中国者多为葡、西之商人、外交家、奥斯定会士、圣多明我会士相比，此时活跃在中西文化交流之间的是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法国的耶稣会士和学者。一般来说，“17 及 18 世纪，耶稣会士是沟通欧洲和远东文化的桥梁”，（利奇温：《18 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以耶稣会士们学术之硕、在华经历之长、交游之广，都是 16 世纪的欧人无法比拟的，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中的“形而上”者的观察，大大深于前人，从而将中西文化交流推进到有实质内容的境界，翻译儒家经典就是从此而步入盛期的。欧人的各种著述、译作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制度、思想、文字，其深度与广度、准确性与可信性，都远远胜于上一世纪，极大地开辟了欧洲学者的眼界。此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是一片“Curious”之地。“Curious”一词，是 17 世纪欧洲文献描述中国时广泛使用的一个词，原文为拉丁文 *Curiositas*，意为求知欲、好奇心、钻研热情。对 17 世纪欧洲博雅之士来讲，“*Curiositas*”往往指类似赏玩古董似的极其精细而注意细节的

娴熟探讨。(李学勤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不过,这也说明,欧洲人此时的眼光,还止于欣赏,尚未完全投射出研究者的目光。

第3时期是18世纪。持续不断的礼仪之争此时进入到了关键阶段。围绕着中国教徒是否可以祭祖拜天敬孔诸问题,来华各派教士各执一端,纷纷在中国的典籍、哲学、历史、宗教、风俗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论据,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欧洲早期的中国通(或曰前汉学家)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而且随着争论的扩大,教会外的学者也被东方文明所吸引,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这其中不乏在欧洲极享盛誉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他们或著书立说,评析中国文化之短长;或翻经译典,介绍诸子百家之学说;或钩深致远,开创汉学研究之局面。只有到了这个时期,欧洲人的“哲学之眼”才显出了明亮的光辉。中国在欧人眼中的形象,除了有形的“罗柯柯”、“中国趣味”外,还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奇韵。在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哈、波维尔、魅奈、歌德的眼中,或充满了对中国的浪漫激情,或充满了理性的向往;而在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眼中,中国则是一个专制、停滞、文明落后的国家,这其中固然有偏颇之处,但其批判也含有理性成分。就这个时期而言,尽管中国在欧人眼中折射出不同的光彩,但总体形象是美好可爱的。应指出的是,虽囿于时代、水平、动机,明清间欧人对中国的看法难免有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等遗漏错谬之处,但他们睁开眼睛看中国,其启后之功,当不可没。

第4个时期为19世纪上半叶。此时中国在欧洲人眼中的地位大不如前。其原因英国学者赫德逊(G. F. Hudson)认为:“除去欧洲新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思想在政治上变得无用这一事实外,还不难找到其他解释。其中之一是19世纪中国自己已不是18世纪的中国了;清朝衰落了,人口过多,行政机构失灵,中国的艺术衰微了。北京已不再有耶稣会士任宫廷学者,随着中国官吏对外国的渗入(无论是宗教的还是贸易的)越来越猜疑和敌视,传教士和商人所传播的对中国的意见也越来越不利。但……最大的原因是欧洲文明的巨大进展,它现在开始是在远远超过中国的水平上运动着。工业革命和蒸汽机时代给予欧洲人以一种他们前所未有的优势感和效率感。欧洲人现在觉得自己不仅在自然科学、贸易和发明创造方面,而且也在伏尔泰认为中国人已经是完美的伦理学方面,都是最优异的。”(赫德逊,《欧洲与中国》)这样,萌发于18世纪末的欧洲中心主义在19世纪得以蔓延。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眼中,中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而在“奥林匹斯山的宙斯”黑格尔的视野里,中国竟被排斥出他的“世界精神”之外,中国的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医学研究、伦理道德、儒道之说等等,都大部分遭到否定和贬低。

可见,明清中国在欧洲人的眼中,其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由朦胧、到清晰、到丰满美好,再受到轻视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很值得后人深思回想。本书仅从语言文字、历史、舆地、交通、科技、译书、宗教、科学和礼俗9个方面,对欧人认识中国的渐进过程作一粗浅的介绍,而且

以前3个时期为主。

借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对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所”的 U. Libbrecht 教授和他的弟子 N. Golvers 博士、G. Moortgat 博士及鲁大“欧洲中国研究中心”表示感谢。1989年至1990年我在那里以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身分进修时,曾得到他们在资料上和学术上的慷慨帮助。我还要对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表示我深深的谢意,感谢《文史知识》自1993年以来每年都给6篇左右的篇幅连载我“明清欧人与中国”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曾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有的被加以引用,有的被译成外语发表,有的被国外学者所索要。这些影响令我不敢懈怠,使我更加认真地对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再加以修改、增补,整理成书。尽管如此,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本书还有不少遗漏、甚至可能是错谬之处,敬请读者多加指教。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中华书局胡友鸣先生,多年以来他一直热心为人作嫁、以繁荣学术为己任,给我以无私的指导和支持。而实际上我与他素不相识、未谋一面。君子之风,永当为敬。

1997年元月于江西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前 言	1
一、“中国字更具有哲理,或许更能用于诸如 数、序等关系的知识构思中” ——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	1
二、“世界历史自中国始” ——欧人对中国历史的探索	39
三、“我们所通常称之为中国的国家,曾被威 尼斯人马可波罗称为契丹王国” ——欧人对中国舆地的了解	64
四、“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发现一条通往中国的 陆道,这是罗马方面的最大愿望” ——欧人对来华陆道的探寻	96
(一)不避艰险的航行者	
(二)陆道上的苦行僧	
(三)梦断西伯利亚通道	
(四)尾声	
五、“中国人的智慧,由他们聪明的发明可以 得知” ——欧人对中国科技的介绍与应用	136
(一)造纸和印刷	

(二)农艺和饲养

(三)医学、数学、天文、地理

(四)诸工百艺、造船建筑

六、“惟有孔学和经典著作,才为人所译,为人所读”

——欧人对中国文献的译介 178

(一)《四书》之翻译

(二)《五经》之翻译

(三)其它中国文献作品之翻译

七、“中国有三种不同的教派,内中以儒教最为通行”

——欧人对中国宗教的介绍与评论 212

八、“在这个国家中,学而优则仕”

——欧人对中国科举、教育的评介 237

九、“中国人的无休止的各种礼节”和“奇风异俗”

——欧人对中国礼俗的介绍和认识 272

(一)衣饰打扮

(二)客套礼节

(三)婚丧嫁娶

(四)节庆宴食

(五)妇规孝道

一、“中国字更具有哲理，或许更能用于诸如数、序等关系的知识构思中”

——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

(一)

古代欧洲和中国，虽少有交往，但那时的欧洲人对中国不甚了了，更谈不上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有什么介绍和研究。

到了中古时代的 1246 年，有一个名叫柏朗嘉宾的意大利人到达蒙古大汗的都城哈喇和林，居住 4 个月后启程返欧，著《游记》介绍契丹(Kathay)，第 9 章有一句，谓契丹国有一部(指南宋)“自有文字”。

1253 年，法国国王圣路易派教士鲁布鲁克出使蒙古，其中《纪行书》中亦有一章提及中国文字及书写方法：“其人写字用毛刷(即毛笔)，犹之吾国画工所用之刷也。每一字合数字而成全字。”

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54—1324)，从 1275 年到 1292 年间，在元政府供职达 17 年，其《游记》虽洋洋万言，罗列万象，但提到中国语言文字，也只是在第

2 卷第 82 章一笔带过：“蛮子省(Manji,指中国南部)流行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一种统一的书法。但是在不同地区,仍然有自己不同的方言。”详则比前人详矣,然离“研究”二字尚相距甚远。

15 世纪末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之后,中、欧文化交流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当葡萄牙、西班牙的使者、教士、商人在黄金、香料、殖民、宣教的驱动下来到中国时,首先就碰到了语言不同、文字相异的问题。他们写回国内的报告、文件以及从中国带回欧洲的书籍,刺激了欧洲人对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兴趣。16 世纪后,这种兴趣促使这一研究成了早期欧洲汉学的重要部分。当然,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种研究存在不少错谬、附会之处,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泰西之人”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

1569 年,第一部专门介绍中国的欧洲书籍《中国情况记》在葡萄牙的埃武拉(Evora)出版。作者是到过东南亚和中国广州活动过的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克鲁兹(G. de Cruz)。这位传教士在介绍到中国语言文字时说:“中国人在书写方面没有固定的字母,他们用字来写一切,他们用这些字来组成单词,他们有数量极多的文字,用文字来标明每件事物;因而只用一个字便可以标明‘天’或‘地’或‘人’,以及其它的东西。”

克鲁兹接着说,中国有许多方言,因而一个人不明白另一个人在说什么,但如果用书面文字,彼此间就能沟通。例如“天”字,写法一样,读音却各异。他曾要求中国人写出所有简单的汉字,但知道这将有“5000 多字”后,就知道这种要求太不现实了。他通过观察,知道中国字不像别国文字那样横着